

21 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

李陀，文化縱橫，2020 年 8 月刊（第 4 期）

【導讀】當前的疫情危機正引爆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現有資本主義體系正經歷著疫情危機的無情考驗。“世界將向何處去”這一古老而現代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為此，《文化縱橫》與李陀先生進行了一次跨越大洋的對話。全文 25000 餘字，主要觀點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疫情危機的來臨，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世界的演變，使得當代世界的總問題發生了改變，20 世紀以來形成的知識/理論框架已經無法使人們準確地認識和把握 21 世紀的問題；

第二，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必須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因為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哪種形式，都是在社會主義的不斷挑戰中走到今天的，社會主義是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參照物；

第三，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已成為世界範圍思考人類問題不可回避的一個重大現象，而中國社會主義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其複雜性，這就為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知識界提出了一項重要任務——研究中國革命與改革的複雜性，這是理解整個現代中國問題的基礎。我們需要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探尋新的更加實事求是的分析框架，而不是躲躲閃閃繞著走。今天全世界都向中國發問：你們從哪里來？你們是誰？要到哪里去？我們有必要給出一份至少自己滿意的答卷。

李陀：歷史上有過幾次可怕的大疫情，等到人類好不容易熬過來，再舉目一望，世界全變了，山河變色，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陌生的世界。這次全球疫情過後，我們會不會也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很有可能，所以從右翼的基辛格到左翼的齊澤克，都在對這種局面做前瞻性的分析和評估，各式各樣，悲觀的多，樂觀的少。但是，檢視這些思想家和理論家所做的形形色色的分析和推測，我認為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他們差不多都是從自己熟悉的概念、知識或理論出發（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電子新技術、民族國家、國際政治等各知識門類提供的思想資源），很多都沒有察覺，這些分析和思考，大致都局限於自己熟悉的語言和話語裏，所以，不管其展望和預測的具體結論如何，他的視野已經被規定、被鎖定。

去年 10 月，我在北京和李零聊天，談及世界未來的時候，說到這麼一個想法：從大趨勢來看，亞洲的最新發展已經使東亞、南亞、東南亞在經濟和文化上有了非常緊密的交流和交錯，亞洲未來形成某種共同體或者聯合體有了一定的現實性，那麼能不能依據這種現實性作進一步的推演：這種勢頭如果不斷地繼續，會出現什麼局面？可以預見，那肯定會深刻影響非洲，帶動非洲各地進一步實現脫殖民和現代化，先後也都走上“小康”之路。這可能嗎？應該很有可能，儘管這個進程會有很多的曲折和暫時的中斷。

那麼，再進一步考慮，它會不會使得亞洲和非洲這兩個大區塊，又形成基於共同利益的某種聯合體或共同體？充分考慮這兩個地方具有共同的歷史經驗（都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裏走向獨立，都有經濟落後的痛苦

經驗)和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這樣形勢的出現不單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

再進一步想一想，一旦這樣的局面實際形成，歐洲會如何？要知道，現在中日韓三國的 GDP 總量就已經超過眼前的歐盟；何況，屆時亞非兩個大洲的發展，肯定會達到一個更大的體量和規模，那時候，歐洲這個“洲”，會如何反應？它都有什麼選擇？又有多少選擇？有沒有可能被吸入這個歷史浪潮形成的大漩渦裏，最後形成亞非歐的聯合體（歐亞本來就是一塊大陸，所謂三個“洲”這樣的現代意識及其格局，完全是近代歷史的建構）？而這局面一旦真的成為現實，世界該發生多大的變化？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又該發生多大的變化？我們現有的關於世界的知識——尤其是我們今天用來認識世界的許多基礎知識——將會受到多大的衝擊？比如，那時候人們再回頭，又怎麼看歐洲中心論？怎麼看大西洋和所謂的大西洋主義？屆時還會有東方和西方嗎？

當然，這樣的前景目前只是一種想像，是某種可能性。但是近幾個月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種種新發展，可以說讓這想像得到了相當有力的支持：很短的一個時間裏，不但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功能、能力都受到了多層面的考驗和質疑，而且，看這期間東北亞三國之間的種種互動，客觀上已經隱隱地含有這樣的意思：地緣經濟學的經濟動力（而不是地緣政治）已經在總體上改變亞洲，再有這三個國家充當整合的發動機，亞非兩大洲在未來繼續加強整合乃是大勢所趨，然後，歐洲也被捲入這個整合，恐怕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大趨勢，只是早晚而已。

當然，如此想像世界形勢變化的新圖景，讓它成為我們思考今天世界的一個方向或者一個底色，要取決於一些條件，比如能不能離開或者哪怕暫時離開民族國家的立場？不是強調中國的崛起，而是整體亞洲的崛起？能不能離開或者暫時離開東方/西方這個二元對立所給定的已經變得很可疑的知識框架？既然 21 世紀的現實正在一步步消解東西方對立中的先進/落後的刻板含義，能不能提出其他可能的、更富於前瞻性的新的思考框架？

這不容易，需要敢於對我們熟悉的知識，特別是以往構成我們思想框架的很多理論和觀念進行質疑，在知識領域革故鼎新。

總之，要是認真思考“這次衝擊會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變化？”這樣的大問題，我們必須設定新的前提，新的符合實際的思想地圖，一些新的思考方向，這樣才能提出一些新問題，或者使一些老問題獲得新的意義。諸如“新型全球化”這個提法是否適當，是否符合實際，“現有的全球資本主義的運行體系”是否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是否其中有斷裂和裂縫，甚至其中有生長新體系（所謂“體系”的定義要有新的內涵）的空間？“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的歷史條件是什麼，是否能夠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外找到新動力？這些動力又可能在哪儿？此外，現有的理論和知識，有哪些可以作為這一類新問題和新思考的思想資源，而哪些只能限制我們的視野，拘束我們的思路，甚至成為我們思考和認識現實新變化和新情況的障礙？這都需要認真琢磨和討論。

《文化縱橫》：這樣的思路很有想像力，不過，在你這“符合實際的思想地圖”的後面，好像更擔心舊知識和新現實的衝突，所以要想充分認識這次疫情後

世界的變化，首先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因循或是沿襲已經與現實有某種不符或扞格的概念和觀念，而是應該對已有的知識和理論有所質疑，這樣才能追得上今天正在急劇變化的現實世界，否則不可能提出新問題，也看不見新現實？

李陀：理論是灰色的，其實知識何嘗不是灰色的？思想、知識、理論追不上現實，是經常和普遍的。何況，這次疫情之前，在世紀之交這段時間裏，世界正在經歷一次大斷裂，21世紀不過是剛剛展開，然而已經出現的種種變故表明，新世紀和20世紀之間有一場大地震，地震前後形成的景色，遠比19世紀和20世紀之間的差異更劇烈，大地不是從一道裂縫中一下劈開，而是四分五裂、溝壑縱橫。所以，疫情不僅加深了或者改造了20世紀本來就存在的危機，而且還突出了21世紀才出現的新危機；在這種情形下，從20世紀沿襲下來的許多觀念/知識/理論，用來認識當下的現實，還是否夠用和有效，就成了需要最先考慮的問題。

舉個例子，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把當代不平等問題以數據分析的形式提了出來，並且認為可以採取直接對高財富群體和資本高額徵稅的辦法來化解危機，其背景是2008年之後，貧富差異已經是一個引起世界普遍緊張的焦點問題。所以這個論述一提出來，就顯得很有當代性，甚至很新，一下子帶動了或者引起了很多幻想，也引得思想界好熱鬧了一陣，很多人都以為找到了一個以民主而不是革命，來解決99% vs 1%這個可怕對立的一個可行的好辦法。可是，看一看最近美國政府為紓解危機所採取的大規模救濟法案的實際效果——3200億美元大多都落到了大企業和上市公司手裏，根本沒有幫助那些本該救助的中小企業，這是對《21世紀資本論》多麼大的諷刺！想想看，即使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美國資本主義的體制可有一點點接受皮凱蒂建議的意思？可有一點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意思？要知道，這個救濟法案可是在美國參、眾兩院依照嚴格民主程序鄭重通過的。

這本書被很多人認為是理論的一次創新，但是，它新在哪里？其實，它所謂的“新”，其要點是把大數據分析引入了對當代貧富分化的研究。但是，引數學模型和數學分析進入經濟學並不是什麼新東西，比如博弈論在20世紀中葉的出現，已經使經濟學開始發生大的轉型，這學科也由此取得了“科學”的資格，從而在科學主義的大潮裏占了一席之地。而皮凱蒂在以這樣的理論來研究貧富分化的時候，儘管以經濟學的概念和語言對資本的積累和財富的集中做了重重分析，但其邏輯結果的最終指向，卻是整個積累過程缺少透明機制，因而需要在市場和資本的運作中建立透明的分配機制以解決財富不均，這就和馬克思從商品、生產關係、剩餘價值、資本運動的邏輯等批判政治經濟學範疇入手所做的分析截然不同，只不過是貌似為資本主義擺脫今日困境提出了一個新思路和新方法。

可是，回顧資本主義的批判史，這種以再分配手段實行“均貧富”來實現人類平等的想法，一點兒不新，只要回顧一下馬克思對普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及其平等觀的批判，皮凱蒂和普魯東之間的思想牽連其實很清楚，只不過皮凱蒂的思想更帶有新中產階級的怯懦特徵——當代的理論和學術很多“創新”都具有這種作風——不敢得罪資本（對比一下當年普魯東的勇敢姿態，這一點就特別鮮明，雖然後來皮凱蒂對自己的論點和論證都做過一些修

改，但全書的要旨並沒有大的改變），又要堅持正義，於是只能以一種恭敬又盡責的態度為資本主義“療傷”。《21世紀資本論》不過是個例子，它的迅速躡紅又迅速沉淪充分說明，如果理論思考不能或者不敢從現實出發，從新問題和新情況出發，往往都是某種理論創新的表演。眼下分析這次新冠肺炎大疫情給世界帶來的變化，也還是要理論聯繫實際，不然預測和推論都難免是空話。

《文化縱橫》：危機發生以來，世界範圍的思想界也因危機動員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反應。你對危機中世界思想學術界的討論有何評價？你認為有哪些更加重要的問題需要關注探討？

李陀：你說到的這些思想反應，反映了世界疫情給全世界帶來的危機的複雜性。有些危機本來就有，比如自“二戰”之後由老式金融資本所主導並組織的全球秩序突然被破壞（這個破壞是後來的全球化的一個必要條件）；不過有些危機是新的，猶如一場大地震造成的新斷層，比如新自由主義的徹底破產和民主政體的危機等。

認識這種複雜性本來就不容易，而我們還面臨著新的困難：在這些五花八門、讓人眼花繚亂的意見的裏面和後面，有著諸多政治立場和學科知識之間構成的或隱或顯的對話關係；這些混亂的對話，又被新舊媒體的網絡進行再生產，加工、改造、放大，以某種准知識的身份進入對話，而這些准知識很多都是偽知識，於是，它們的入侵就形成次一級的混亂信息和話語，縱橫交錯，層層疊疊。這給我們認識現實世界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嚴肅的知識和真假不清的媒體信息被混淆重疊，甚至粘連，以至出現這樣奇異的情形：什麼是“認識”的依據和出發點，完全被攪成一團，模糊不清；於是不止一般人，包括學者和思想家在內，也往往都被媒體牽著手走。如此，其“思考”的基礎，既不是嚴格的傳統意義上的知識，也不是反映了事實的可靠信息，而是被新舊媒體、網絡新聞和各種大小自媒體所共同創造的某種加工物。於是，這些本來混亂虛假的思考之間，又發生了十分激烈的衝突，形成許許多多不可調和的“撕裂”。與此同時，無所不在的資本勢力和政治勢力趁虛而入，以各種手段在其中駕馭和操作，讓本來相當虛假的撕裂，很怪異地有了真實內容。

《21世紀資本論》所引起的思想衝突，就是這種“撕裂”弄假成真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皮凱蒂的所謂的理論創新，骨子裏面是一種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點都不新鮮的“補天”思想。但是由於媒體摻和其中，又肆意操弄，上下其手，把它和《資本論》做了一種充滿商業謀略的聯結，結果鬧得知識界裏無論左派和右派，都不得不出來紛紛表態，來了一場不大不小其實沒什麼意義的混戰。這是 21 世紀特有的一種荒誕，但是這荒誕構成當代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一大特色。

再看這次全球大疫情，其中也充滿這種荒誕，諸如西方國家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政府在武漢斷然“封城”的舉措，以“口罩外交”為標誌的各國之間充滿戲劇性的防疫合作（還有反合作），西方“禁足令”引起的有關人權和自由的衝突，尤其是人道主義這個神聖的“普遍價值”，竟然被瘟疫裏形成的“人命優先？還是經濟優先？”這個冷冰冰的問題，以制度的名義甚至以倫理的名義貶

得一文不值——荒誕可以說舉不勝舉。讓人驚訝的是，面對這些被常態化甚至日常化的荒誕，跟著媒體起舞的右翼就不用說了，連歐美知識界也集體表現出一種令人震驚的漠然，即使有個別異議的聲音，也不過是喁喁私語。這一切讓你懷疑他們是不是完全忘記了他們的歷史上還出現過一個以寫荒誕著稱的作家，名字叫卡夫卡。

因此，在思考和討論這次大疫情可能產生的後果的時候，首先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思考遇到了什麼樣的實際困難，“知識”是否支持了我們的思考，甚至它是不是妨礙了認識現實？如果借用哲學的一個概念，是不是可以說，今天我們遇到了認識論障礙而不自知？

《文化縱橫》：自疫情危機發生之後，西方傳媒領域幾乎集體選擇負面看待中國的抗疫舉措，客觀理性的報道少之又少。這其中除了意識形態的長期思維定式之外，的確有“認識論障礙”的存在。面對中國崛起現象，面對特朗普現象，面對世界範圍的民粹主義浪潮，西方思想界（無論左右）似乎逐漸喪失了把握客觀事物進程的能力，預設的價值立場總是與客觀事實脫節，這究竟是為什麼？

李陀：一般來說（進入哲學思考，就複雜了），知識是否正確，要在社會實踐中被檢驗。可是今天出現了一個特殊情況：疫情似乎為人類設置了一種可以對知識的正確性進行檢驗的掃描機。於是，只不過幾個月很粗糙的掃描，我們就赫然發現，這種“逐漸喪失把握客觀事物進程的能力，預設的價值立場總是與客觀事實脫節”的現象，不但非常廣泛，而且獲得了歷史上罕見的普遍性，百姓如此，專家學者也如此，以致我們可以這樣發問：是不是人類的總體認識能力出了問題？如此疑問，當然是非常嚴重的發問，要回答，不容易。剛才說到了“認識論障礙”（這個概念是巴士拉在《科學精神的形成》這本著作中提出來的，這裏挪用一下），或許是討論這問題的一個可能的角度。那麼，障礙在哪里？障礙是什麼？是什麼構成了障礙？如此追究，可追究的就很多了。

前邊我們談到，新舊媒體構成的網絡超級工廠，每分每秒都在對現實信息和現實話語進行加工、歪曲、改造，然後把這種加工物或“准知識”塞入或者混入今天的現實思考，其產生的破壞作用，決不能低估。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新冠病毒起源的追溯。在過去，這種追溯本來是醫學界和科學界的責任，醫生和科學家的知識權威，是這種追溯的保證，不論追溯過程的方法和手段，還是最後結果，只能由醫生和科學家說了算。但是，在近幾個月裏，由於各類新舊媒體的介入，事情的發展讓我們目瞪口呆：所有專家幾乎都被靠邊站，反而是新舊媒體一片喧嘩，紛紛挑起溯源追蹤的重擔，而很多官員、政客以及公共知識分子，還有網上的眾多吃瓜群眾，竟然變成了主角，自信又自負地認為他們是權威，他們有能力揭示真相。

在這樣的形勢裏，今天完全進入冷戰格局的西方媒體，已經不是順便或試圖“帶”風向，而是公然定風向（背後的種種政治操作，已經不再猶抱琵琶半遮面，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這很荒誕，可僅僅譴責荒誕，有什麼意義？如果從知識的角度看，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是當代以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格局出了毛病，正在變質？再如冷戰中

形成的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機制，也在今天的現代學術生產中越來越重要，這都意味著什麼？誇大一點說，是不是人類的知識形態和知識環境發生了巨變？若果真如此，這個新環境是不是已經成了今天認識論障礙的一個因素？

從知識環境正在發生大變化的視野看，20 世紀知識的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化，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不用多說，學科的細化經歷了近兩三百年的演化歷史，在 20 世紀完備起來，這當然帶來了種種巨大的好處。但是認真琢磨，知識的細化又帶來了很多嚴重問題，其中之一是每一個學科都不得不把認識的視野盡可能窄化，把知識的領域不斷分切，最後的局面很像是占山頭，如同歐洲中世紀的一個個堡壘，且堡壘與堡壘之間還有很深的壕溝和高高的圍牆(隔行如隔山)；同時，躲在堡壘中的學者、理論家，又往往把自己學科內的研究成果賦予盡可能重要的普遍意義，即使不能被認可為真理，至少也是解釋人和世界某個方面的一把金鑰匙。這樣，不但自然、人類、社會不再是認識和知識的整體對象，而且知識本身，也如同一面鏡子破碎之後形成的碎片——可是很多人不覺得那鏡子已經碎了，還在碎片的閃光裏努力摸索真相和真理。

這帶來一個後果，就是很多擔當知識生產重任的人，教授、學者、理論家、媒體人、科學家，都不再關心知識對象的整體性，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可能，森林中的某一個物種，某一片沼澤，或者某一種珍稀植物，已經被研究和認識得很細緻、很透徹，讓我們對森林增加了很多知識，可是森林在哪里？關於森林的整體知識又在哪里？

剛說的這些看法，也許你覺得這話別人都說過，老生常談。那就把我的意思具體化一下，說一下福柯，從他說起。說實話，在我努力學習和瞭解 20 世紀後半葉由符號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帶動或者推動起來，並且於 70、80 年代形成高潮的學術和理論創新大潮（很多人把它們歸結為都是“後現代理論”，是不準確的）的走向和脈絡的經歷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福柯。以至於當我審視這個大潮裏其他思想火焰的時候，我總是會從他的理論視角去做評估和比較，一方面幫助自己找到認識這些新理論的立足點；另一方面，由於對他的思想漸漸有了深一些的認識，甚至覺得在“弄潮兒向濤頭立”的諸人之中，他是貢獻最大的一個。

但是，今天當我們已經到了 21 世紀，不知不覺，新舊世紀的大斷裂所帶來的新問題如此尖銳地凸顯，以至我們再也不能回避，其中最為迫切的就是：我們面臨的種種危機（就是前面說到的“溝壑縱橫”）和當下的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關係？與此相關，進一步的追問則是：如果今天的資本主義明顯和 19 世紀以及 20 世紀的資本主義在形態上和機制上都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世界範圍內貧富差距被拉得如此巨大，是以往經典資本主義做不到的，然而，這也僅僅是當代資本主義新問題的表徵之一），那麼不同在哪里？這種不同和我們面對的這些危機是什麼關係？其中的必然性又是什麼？這些問題是不是都急需回答？可是我們帶著這些疑問去詢問福柯，我們能得到什麼？恐怕所獲有限。

福柯對資本主義最深刻的批判，是生命政治的論述。福柯對與生命控制相關的國家治理方式和策略做了歷史的追蹤，對近代國家為適應資本主義發展逐漸形成的生命政治做了考察，指出這是一種前所未有、不易被人察覺的特殊治理“技術”，並且他還進一步把這種“技術”和新自由主義籠罩下的 20 世紀資本主義聯結起來，揭示新自由主義框架下的經濟體制和統治制度是如何掌控生命，如何最大限度地壓榨生命，如何形成了新自由主義規範下的生命政治。不用說，這些論述放在資本主義批判史的脈絡裏，是十分重要的思想和理論發明，對我們認識資本統治的新形式、新機制增加了新的層面和新的視角。

不過，如果你跟著福柯再走下去，就多少會洩氣，因為你會發現他這批判最後還是走向了主體性這個方向（一路上還伴隨著尼采、弗洛伊德、拉康的身影），或者說其核心主旨還是主體問題——資本統治術如何“深入人心”，以建構對其“治理”更方便有效、以“自我”包裝起來的一個個小主體，然後從微觀到宏觀，從而順順當當地駕馭社會大主體。這很精彩，是不是？可是，思想採用這樣的策略，只能幫助我們認識資本統治的一個層面；一旦進入這個層面，其中又有無數的小徑和歧路，而每一個小徑都花草紛然，讓你覺得風景有異，流連忘返。

然而，這有嚴重的後果：我們思考的對象于無意中被微觀化、零碎化或者區域化，我們看不見大風景——20 世紀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變，這改變如何對資本主義的傳統“去經典化”，金融資本如何膨脹和演化成為統治世界的隱形司令部，科學技術又如何成為意識形態（哈貝馬斯在這方面的論述也很重要，但福柯走得更遠），這樣的新意識形態又如何超越“新自由主義”在最近二十年內建構出當代新秩序——這一切宏觀的可能的知識對象，就悄悄地被淡化了。福柯當然重要，但是放入這樣的思考裏，他的重要性就需要重新評估。畢竟，這位思想家的底子，還是 20 世紀語言學/結構主義的思潮提供的知識。這就回到了我們前面談到的知識被過分地學科化的問題，符號學也好，話語分析也好，精神分析也好，有關主體性的各家思想和流派也好，都無不或明或暗地受制於此背景。儘管跨學科在福柯的理論和學術研究裏已經非常突出，表現出一種突破學科限制的自覺，但其批判視野在 20 世紀還是難以應對正在急劇變化的當代資本主義這個龐然大物，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難免的，也是必然的。

這麼說福柯，沒有貶低他的意思，而是想強調，在人文知識領域，學科的細化今天已經對認識活動和知識生產有嚴重障礙作用。即使像福柯這樣有強烈批判意識的思想家，其批判的能量由於被知識分類細化而受到如此局限，其他的種種批判又能走多遠？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人們開始懷念馬克思，《資本論》又重新“熱”了起來，絕不是偶然。其實 20 世紀的思想界，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對資本主義的研究，無論在學術層面還是理論層面，數量並不算少。可是，若把這些研究和馬克思相比，你總會覺得少了什麼，到底少了什麼？這需要琢磨。

《文化縱橫》：在此次全球危機中，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分析“二戰”後的資本主義運動？在您看來，“二戰”以來的資本主義運動有哪幾個重要階段？不同階段有什麼主要特點？

李陀：這些問題都很大，都是很專門的研究領域，每一項都是一個專題工程，思考和研究都很不容易。所以我還是想再次回到剛才的話題上，不過轉一個角度，換成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想要對資本主義當代發展做分析，需要什麼不可或缺的條件？這就要回頭看看以往這些年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有沒有什麼方法上的不當，有沒有什麼知識上嚴重的忽略？如此提問，可以檢討的東西當然很多，但是我以為其中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資本主義不是孤立地自己發展，它有一個如影隨形的同行者，那就是社會主義——它們不但有著共同的歷史，糾纏在一起共同發展，而且直到今天還是如此。

在這次疫情裏，北歐某些國家很受注意，許多人認為這些國家的政府的應對很得當。可是正如有些觀察指出的，這樣的應對得當，和北歐國家是典型的“福利國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如果進一步追問：福利國家是怎麼來的？那就必須追溯歐洲自 1848 年革命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反抗的歷史。沒有近百年的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統治不斷持續的革命，沒有歷次的血腥鎮壓（光是巴黎的起義者流過多少鮮血？更不必說“一戰”前後歐洲各地革命者的犧牲），還有資產階級在這血腥氣味中感受到的恐懼，更不必說後來十月革命的成功給資本帶來的更深的恐懼，會出現福利國家這種東西嗎？所以，絕不能忽略資本主義不但有一個不斷戰勝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還有一個對社會主義不得不做妥協的歷史，一個被迫地不斷自我改造的歷史（忽略這個“自我改造”，你就很難理解資本主義在 20 世紀的變形、變異和變革）。總之，是這兩個歷史構成 20 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德國作為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說是這方面一個更有力的說明。為什麼在這次世界疫情災難的處理中，默克爾政府顯得這麼從容不迫，和美國政府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我覺得，這既不能從默克爾的能力得到充分說明，也不能僅僅從德國此次表現出色的公共衛生體系裏得到充分的說明，那還是要回到歷史：德國在 19 世紀末前仆後繼的工人運動，還有雖然短暫卻留下永久痕跡的魏瑪時期，更不必說有著悠長歷史、“二戰”後又有著長期執政資歷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深刻影響等，都是對資本主義的嚴重挑戰，也都為當代德國的資本主義在制度層面留下深深的刻痕，這些刻痕形成了這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它們總是被避而不談，或是被選擇性地“遺忘”），正是這些因素在今天的疫情裏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讓它的政府能夠不慌不忙。

總之，今天的資本主義並沒有一個純粹的、獨立的發展，歷史上沒有，今天也沒有；現世存在的無論哪一種資本主義制度，都是在社會主義的不斷挑戰中才走到今天的，因此社會主義是認識今天資本主義絕不可或缺的歷史和現實。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批判，決不能忽略這一點。

但是，20 世紀很多資本主義研究大多在這方面都有盲點，很多都是假定有一種純粹的、單一的、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又從這樣的假定裏建構一個研究對象，然後發明出種種有關民主、人權、全球化和歷史終結等學說和理論。當然，在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想傳統裏有點不同，從馬克思到霍布斯鮑姆，這“兩個歷史”恰恰是思考世界近代史所必需的基本條件，從《共產黨宣言》開始，不少著作和文獻對此都有充分的體現。然而，如果檢視 20 世紀關於資本主義的研究，恰恰是從來糾纏在一起的“兩個歷史”的歷史越來越被淡化、

被虛化的歷史——福山在 1989 年洋洋得意地宣佈“歷史終結”，絕不是偶然的。這個“終結”和以往各種終結論的版本不太一樣，其中有兩個隱藏深處的意思：一個是忘掉“兩個歷史”始終糾纏在一起的歷史，忘掉社會主義如何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持續近百年的挑戰和鬥爭；另一個就是終結各類現實版的社會主義，無論是烏托邦，或是某種進行時的現實試驗。

幸而這次大疫情給人類一個機會，世界大舞臺上一層又一層的幕布被揭開，虛假的踢踏舞演出露了餡，舞臺後許多暗藏的機關也都一下子現了形，無論是誰都不得不动腦筋重新來認識和思考本以為很熟悉的這個世界。但是**不論新事物有多少(比如人工智能)，最迫切需要重新認識的仍然是資本主義**——這個在全球化的進軍裏蓬勃發展，一路鮮花（用霍布斯鮑姆的話說，自從柏林牆倒塌以後，資本主義已經把恐懼給忘了），曾經在 20 世紀 90 年代宣佈自己取得最後勝利的資本主義。

問題是，這已經是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其形式和內容（暫時借用這兩個文學批評裏的用詞）都獲得了更新，我們需要辨認它，認識它。

《文化縱橫》：為什麼在全球已經出現資本主義大危機的情況下，全球的 99% vs 1% 的運動並沒有帶來社會主義運動的新方向？21 世紀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桑德斯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中佔據什麼樣的位置？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需要在什麼方向做突破？

李陀：坦白說，你這些問題都切中要害，給出回答有迫切的需要，可是我沒有能力做出清楚又比較全面的回答。我能說的，只是我近些年的一些觀察，還有從這觀察裏生出的憂慮。

先說說“全球的 99% vs 1% 的運動”。這個運動的高潮是 2011 年“佔領祖科迪”的行動，我當時有機會作為旁觀者目睹了祖科迪廣場上的情景，整個過程中紐約青年人意氣風發的自信，特別是那種劍鋒直指華爾街的高昂戰鬥熱情，讓我不禁想起當年薩特發出的鼓動：“我們可以做許多白日夢，可以失敗，可以哭泣，可以光芒萬丈。”但是，今天回顧，那時候青年人佔領廣場並不是白日夢，而是想效法 1968 年的五月風暴：巴黎大學生以佔據索邦大學的行動喚醒了整個法國，證明 1848 年的革命傳統只不過是暫時陷入了沉睡，巴黎上空再次飄起了紅旗。可是，同樣是佔領，美國的大學生們卻沒有達到“喚醒”的目的——祖科迪廣場雖然轟轟烈烈了兩個多月，但是沒有獲得類似五月風暴那樣的喚醒，不往遠說，僅隔幾個街區，曼哈頓無處不是酒綠燈紅、車水馬龍。

今天，以上兩個佔領都已經有了無數的追憶文章和歷史研究，功過評價，論議紛紛。不過，有一點恐怕是共識：就其反抗資本主義的大目標來說，青年人失敗了。為什麼失敗？這也有很多研究，我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這運動的骨幹，無論發起者還是參與者，和當年巴黎的青年人一樣，基本都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們”（程巍有一本很好的分析“五月風暴”的著作，書名就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們》），這使得整個“佔領”運動都帶有濃厚的中產階級烙印：整個運動沒有對形成 99% vs 1% 的根本原因做深刻的批判，而是一種吶喊和控訴，而這樣的控訴很容易變成來自遠方的回音，不能損害資本主義半根毫毛。

你問我，“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需要在什麼方向做突破？”這也是大哉問。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往往被國內思想界忽略，其實那是 20 世紀歷史上最富於戲劇性和悲劇性，也最波瀾壯闊的一幕，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其中的挫折和失敗，其實那些失敗經驗更寶貴，都可以豐富社會主義思想和理論的發展，可能比歐美目前學院派路數的思考更值得重視。遺憾的是，我瞭解得很少，不能說什麼，這還需要中國思想界特別是研究南美問題的學者們，做更多的調查，下更多的功夫。學者索颯早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寫了《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直到現在依然影響很大，可是這類專門且深入的研究，還是太少了。我覺得很多人還是不能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總認為歐洲的新觀念和新理論才是世界思想的前沿，這已經不符合現實。其實在當前，思想發展的前沿已經轉移到“南方”，非洲，拉丁美洲，還有中國。

至於桑德斯的社會主義，的確是當代美國非常新的事情，得到了數量眾多的青年人的熱烈支持，已經形成一股潮流。但是，桑德斯的理念和主張與皮凱蒂沒有根本的區別，都是把問題集中於均貧富上，不涉及根本。如果把這樣的聲音拿來和一些對資本主義進行真正批判的思想對比一下，例如和薩米爾·阿明的理論作對比，那就很明顯：桑德斯代表的是帶有一種中產階級的溫和特色的“改革”訴求；阿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完全不同，他的批判不但直接而且非常尖銳。阿明理論的一個突出部分，是認為資本主義的歷史從來就是帝國主義的歷史（他還特別強調這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有區別），是這個歷史形成的“中心和邊緣”的政治經濟結構，以及由此建構起邊緣不發達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一種依附關係，對全世界的民族和地區進行了跨世紀的無盡無休的剝削，一直到今天。所以，撥開阿明理論的層層論述，其核心是剝削，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當代剝削，只不過他不把當代剝削問題和剝削體系局限於一國一地之內，不以民族國家做觀察和分析單位——在他這樣的視野裏，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廣大的“世界工廠”正是在這樣的全球化剝削關係之內，而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工，正處在這種現代剝削的最底層，在其上，那是全球化所建築的現代剝削關係的“上層建築”。

當然，如此簡單的概括，不是阿明理論的準確表達。不過，即使如此簡述，也可以一眼就看出阿明和桑德斯思想的區別：貧富分化是桑德斯的主題，而對於阿明則只是資本主義全球性剝削、剝奪的一個物質後果；前者的主張，並不涉及 99% vs 1% 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當代的全球性剝削有沒有關係？如果沒有，那 1% 的天文數字的財富是怎麼來的？如果有，那又是什麼關係？桑德斯不可能這樣提問題，也不想這樣提問題。

另一方面，也要正面看桑德斯所代表的社會主義訴求的積極意義。畢竟從 20 世紀“紅色的 30 年代”以來，在美國社會裏，這類聲音不但非常微弱，而且幾乎成了一種有原罪的東西。今天能夠這樣大聲地呼喊出來，並且得到那麼多青年人的熱烈支持（其主要成分還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們”），那還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了美國社會正在出現深刻的變化，至少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阿明稱之為“爭取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部分。不過，我還是想強調，這樣的訴求實際上充滿了中產階級的性格特色，是美國中產階級懷念 20 世紀 70 年代前後的順心日子，而今天卻落入今不如昔、前途暗淡、日日有下降到窮人階層那種恐懼的表現。

《文化縱橫》：這樣評價桑德斯的社會主義，特別是拿桑德斯和阿明做這樣的對比，讓社會主義理論如何創新的問題變得特別尖銳。蘇聯解體之後，歐洲境內已經是完全的資本主義世界，但是社會主義觀念和社會主義訴求都相當活躍，各種社會主義派別的活動都有一定的空間，各種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左翼思想（也包括馬克思主義思想）近些年都在不斷發展，出現了不少重要的學者和理論家。在 21 世紀，特別是在這次疫情之後，歐洲作為有最悠久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有過巴黎公社的悲壯和十月革命的輝煌的地區，那裏是否會出現社會主義思想的突破？

李陀：作為一個作家和批評家，我關注的領域主要是文學，可是今天文學面臨的許多困難和障礙，都被深深楔入了當代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的鬥爭中，和世紀之交的很多大問題密切交融。今天“是否會出現社會主義思想的突破”，看似和文學有一定距離，但實際上它涉及文學發展的大局和方向，尤其在文學和政治的關係被全球消費主義日益淡化的情況下，它還涉及在激烈變更的當下現實裏能否重新定位文學，也涉及對未來文學的想像。所以，我很樂意進入這樣的思考和討論。

在今天的形勢下，如何才能實現社會主義思想的突破？這牽涉很多問題、很多方面，有理論，有實踐。不過，我們前邊討論的“認識論障礙”，對這個話題的展開還是一個重要途徑。如你所說，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一直連綿不絕，不斷有新的發展。“二戰”之後，左翼思潮還是相當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馬克思主義思潮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話語場，其中不但色彩斑斕，還充滿了對立衝突，形成了德、法、意等國家學術和理論界的重要風景。但是，今天回過頭看，特別是聯繫這次疫情帶來的全球形勢大變化的新現實來看，這個思潮中的很多思考需要重新檢視和檢討，其功過應該重新認識，重新評價。

前邊說到了福柯思想的盲點和局限。如果追蹤其局限的來源，我們不難發現，儘管福柯在他的理論建構中很努力地克服和超越種種源頭思想和知識對自己的影響，但無論如何，福柯的理論具有很強的學科性，那種強烈的學科知識背景，既形成他的論述風格和策略，也構成他的理論的隱形邏輯框架。問題是，福柯思想的這種特色，絕不是特例。“二戰”後西方左翼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理論，差不多都穿有一層或幾層學科的知識軟甲，其舉止都不能不受這軟甲的拘束。即使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如阿多諾，他的理論活動都自覺地進退於哲學和美學的藩籬之內；更不必說與福柯同一代或更晚一代的那些左翼思想家和理論家，各自都有清楚的學科背景——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符號學、思想史等。20 世紀後半期，他們還都紛紛進入大學、學術或半學術機構，成為教授、學者，成為職業的知識生產者（像葛蘭西那樣投入革命鬥爭最前沿身體力行的實踐者，已經只能活在記憶裏了）。

這樣的局勢當然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但是就這些知識的生產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來說，我們看到在 20 世紀裏有一個漸變的過程：那就是批判的重心逐漸轉移到現代性、主體性和主體建構、理性和無意識、身份政治、文化符號這一類特別“火”的主題上。在這轉移中生長出的很多理論和學說，雖然都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有或近或遠的關係，有一些還推動了批判的深入（後殖民理論尤其突出），但大體上這些理論的對象或認識對象的設立，以及依據

其對象建構的一套概念體系，其實已經不同程度地偏離了《資本論》的方向。這就造成一個尷尬：當我們需要對今天 1% 和 99% 的巨大財富差異所形成的世界範圍的對立作出解釋的時候，當我們需要對過去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剝削和當代的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關係做出分析的時候，當我們需要把它當做突破口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新性質做出理論描述的時候，就會覺得這些理論不但幫不了多大的忙，還讓我們心生疑惑——祖科迪廣場上的青年人高舉標語牌聲明“我屬於 99%”“把我們的未來還給我們”“權力屬於人民”的時候，其實於無意識層面有一種“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 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的彷徨，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鬥爭的旗幟上，應該寫上什麼樣的歷史目標。

這讓我想起歐陽江河長詩《祖柯蒂之秋》裏的幾句詩：

即使資本的費解，

變得像一加一那麼易懂，

答案是二的現實，絕非年輕人所要的。

是問題壞了，而非答案。

關鍵是問題如何能提得正確——這讓我想到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裏，阿爾都塞反復討論和論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理解和認識一個理論，最重要的前提是要理解它所提出的“總問題”（這個概念的翻譯，問題複雜，分歧很多，我這裏還是暫用“總問題”這個譯名）是什麼，也就是要理解和研究其理論所確定的認識對象，以及由這個對象所確定的問題設定——這種設定又必然包涵一系列基本概念的設置，而這些概念自身的運動以及彼此間的互動，自然就形成了具有一定內在邏輯的思考空間。因此，總問題的提出和設定是決定性的，它既決定一種理論所具有的視野，也決定其思想的邊界。

拿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來說，他的思考和研究，涉及領域十分廣闊，學科跨越度很大，有意以此克服學院體制的限制。但其理論研究最重要的部分，還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和“後現代社會”（儘管晚期的研究方向有些變化）。為此，在這一對象的規定之下，其最重要的基本概念，是晚期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現代性/後現代性、時間和空間、文本/敘事、碎片化、精神分裂等（一個色彩斑斕的概念族群），如此形成的理論域，實現了對所謂後現代所指稱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生產和意識形態狀況的廣泛掃描：一方面全力發現貫穿其中並相互疊加的內在邏輯；另一方面，對當代資本主義怎樣完成對人精神和內心的殖民做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不少理論家都盡力于此，可是我以為詹明信的工作最為細緻和深入），讓我們手中握有了一張得以認識 20 世紀資本主義的新地圖。

然而，如果我們想憑藉詹明信的理論嘗試回答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何以完成了 1% vs 99% 的奇跡，就不免失望。你也許會問，怎麼又回到這個題目上來了？我的回答是，因為 1% vs 99% 不是個數字，它既是當代世界如何不公平的一個象徵、一個指標，也是一個思想的入口。這個數字裏隱藏著關於當代剝削的秘密，隱藏著當代資本統治世界的秘密：1% vs 99% 已經是一個全球現象，那它是怎麼形成的？是不是有一個全球性的無所不在、遍及各地的剝

削關係？既然今天已經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這樣可怕的剝削和當代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關係？我以為，對所有左翼和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人來說，這都是一道躲不開、繞不過的考題。那麼，你就應該理解我對詹明信有關“晚期資本主義”研究的失望，儘管我一直對他的工作有很大的好感，甚至覺得很親切（這和我多年從事文學批評有關）。

回過頭來再看阿明，拿他和詹明信相比——也許有人覺的這不太好比，不合適。可是我以為既然都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都和《資本論》有著內在的血緣，那就一定有可比之處——誰能更讓我們解惑？誰能更讓我們理解，或者更深入思考資本主義在 20 世紀末期和世紀之交這幾十年的新發展？那還是阿明。至少我自己覺得，就《資本論》所指明的大方向而言，他離這個方向距離更近。這個“近”，很值得琢磨，阿明不僅有埃及成長的背景，曾積極參與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而且他的學術活動不那麼學院化，在埃及和非洲其他國家都參與了許多具體的發展經濟的實踐活動，例如他擔任過馬里規劃部的專家，在這個崗位上幹了三年——這些經歷使阿明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響，使得左翼知識分子有了另一種光彩。

不過，還要說明一下，這裏說詹明信，不過是個例子。由於受學科細化（背後其實是知識生產模式和規範的現代化，是 18 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演進對知識實行改造的一個結果，科學知識的生產模式日益成為人文學術需要學習的樣板和模範）的影響，妨礙我們解釋/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秘密的情形，是很普遍的。不過，這樣的“妨礙”，也不能全都歸咎於“知識”出了問題，如果深入分析，其實還有更複雜的原因。這也可以舉一個例子——薩特。

對這位哲學家，我有特殊的敬意。因為即使在“斯大林主義”風波之後，當很多人談社會主義就變臉變色的時候，他不但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立場，還公開宣稱自己支持社會主義。在“五月風暴”期間，當左翼青年的《人民事業報》被查封、編輯被逮捕之後，他不但出任這個報紙的社長，還和波伏娃一起走上巴黎街頭發放《人民事業報》，聲援造反的學生。這些特立獨行，在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裏是很少見的，太難得了。可是，無論他的存在主義哲學，還是他的文學作品，或者是他日常生活裏的德與行，都明顯帶有一種很鮮明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品格和特徵。甚至可以說，如果有興趣研究 20 世紀人文思想發展和中產階級思想的關係，薩特是一個很好的標本。不過，這涉及近百年來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地位、角色的變化，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現在這個話題。

《文化縱橫》：在你所描述的知識譜系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歐美左翼對資本主義當前矛盾的批判與行動，更多具有你所說的“中產階級”化的傾向。對於歐洲左翼的這種思潮演化，你能不能更概括性地加以說明？

李陀：這涉及一系列很麻煩的問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究竟有沒有中產階級？如果有，如何定義中產階級？如何確定其社會位置？特別是如何給予階級分析？圍繞這些問題的著述和論述太多了，在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理論、文化研究、馬克思主義等領域，都是很熱的學術和理論話題，議論紛紛，即使想做一點“概括性地加以說明”，也十分困難，不易說清。

我只能說，我自己做的選擇是：不但認可中產階級的歷史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認可賴特·米爾斯在其 1951 年寫就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中對新中產階級特徵的描述和評判（雖然講的是美國，但是所論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我認為“二戰”前後首先在發達國家出現的新中產階級為我們帶了新現實：一方面，這對過去以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對立作基本框架來認識、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構成的習慣思想，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現實的階級存在，這個“新階級”介入了現實世界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無論其建設性，還是破壞性，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和當代資本主義的變異和更新之間是什麼關係，是一個大題目，應該單獨立項做具體的研究。你現在的這個問題，也應該在這個大題目的範圍之內。

為了不說得乾巴巴，還是說點具體的吧。前些日子，我把薩特的《語詞》又讀了一下，這本“自傳”被看作薩特以精神分析方法對自己的思想發展做分析的書。不過，既是自傳，書中畢竟有不少“寫實”的內容，其中的很多細節讓我不生很多感慨。在他的兒童時代，他的苦惱是什麼？不過是在盧森堡公園嬉戲的孩子們，都看不上他，都不帶他玩兒。“貧窮焦慮症”的種種煎熬和滋味，離他太遠了。他的童年，只有兩件事讓他掛心：讀——祖父的書太多了，塞納河邊書攤上可以挑選的舊書舊刊太多了；寫——他不過十歲就已經自認為是個作家了，著急的是自己的寫作能不能被祖父和母親認可。有沒有別的憂慮？當然也有，不過那都是大致幽困在“自我”的心理藩籬之內的小愁緒。也許我誇張了，一個有著這樣又平靜又純粹的幸福童年的思想家，他選擇以“自由”這個美麗的讓人人嚮往的概念做終生思考的方向，不是很自然嗎？不是合情合理嗎？甚至於，不是很必然的嗎？（對這一點，他《死無葬身之地》等幾個劇本，比他的哲學著作表達得更清楚。）

當然，你可以說薩特畢竟是個別例子。可是，如果我們對巴黎高師這個法國思想家的搖籃做一點調查，不難發現從這個搖籃走出來的諸多人物，不論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其成長背景都和薩特大同小異。他們大多都有一個中產階級或更富裕的背景，並且除了正好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還都有出校門進校門出入“三門”的經歷，最後又都進入學界，在 20 世紀後半期成為操弄思想潮流的學院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員。我常想，仔細琢磨這些東西，其中可以深入做研究的題目真是太多了。

其中一個很典型的標本，是以弗吉尼亞·伍爾芙為代表人物的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這些知識分子（也許有人覺得這個圈子的人物距離今天太久遠了，可是“典型”永遠不會過時）。這個“圈”的人，雖然都大名鼎鼎，可其實什麼行業都有，不但有作家福斯特，有做藝術批評和美學的克萊夫·貝爾和羅傑·佛萊，有經濟學家凱恩斯，而“圈”子外和他們過從甚密的，還有哲學家羅素、T. S. 艾略特和喬伊斯——都是精英裏的精英。是什麼把這些人聯繫在一起，而且聯繫得如此緊密，幾乎成了迷人的神話？追究起來，因素自然很多，不過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他們共同的中產階級文化趣味。

現在有些關於中產階級的研究，把文化趣味看作是中產階級得以建構起來的主要因素（如約翰·斯梅爾的《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一書就很典型，它把文化趣味當做中產階級形成的一個特殊機制），這我不贊成，但是可以把“趣味”

當做階級分析的一個入口。這麼看，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一個明顯的特徵，恰恰是他們共同分享的文化趣味：這不但體現在他們都出身劍橋——“劍橋人”共同享有的劍橋文化是舉世聞名的——而且體現於他們日常生活中對高雅品位的追求，體現在他們還把這種品位滲透於哲學和藝術的發明和發現，體現於他們共同對現代主義的迷戀，體現於他們還把這種迷戀轉化為文學和美學的實踐。而且，由於這些實踐的綜合，在 20 世紀現代主義文化的發展上，布魯姆斯伯裏的知識分子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一直認為，現代主義的文學和藝術，是中產階級（更準確一點是新中產階級）為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社會理想所進行的文化建設，也是一種讓這個“新階級”區別於資產階級、區別於老中產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新文化。這在 20 世紀的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場複雜而長久的遍及哲學、美學、文學的思想衝突，而且一直影響到當前。雖然關於這些衝突已經有了很多研究，但是對之專門做階級分析的，實在不多。總之，如果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只是個例子，那麼一下個問題來了：這是不是例外？想一想類似這個文化圈的各種“圈子”，是遍佈現代知識界的普遍現象，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普遍生活狀態。那麼，在其他領域中是不是也有類似情形？且也很普遍？

這讓我們不能不聯想到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一些情況。

就歐美主流理論的變遷來說，不管立場和傾向有多少差異，只要有所創新，差不多都受到了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之交產生的幾個理論突破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尼采和弗洛伊德，還有稍晚一點的結構主義。而且，如果說前代理論傳統往往對後一代思想家有“影響的焦慮”，那麼在 20 世紀的很多學者和理論家那裏，我們看到的“焦慮”並不明顯；相反，你會感覺到當他們引入尼采和弗洛伊德以發展自己的思想的時候，其實更多是某種快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域裏，這個現象也很明顯。你要是檢索一下近百年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者“新馬克思主義”，很多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和發展也都和尼采、弗洛伊德或者結構主義（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如弗洛姆，就直言要用弗洛伊德補充和改造馬克思主義，而且影響很大。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重要成員，他的作為不能不讓我們提出疑問：如果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這種發展和《資本論》的大方向有沒有出現偏差？當然，你可以質問我，難道弗洛伊德不是的確在人類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裏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難道不是的確對人的心理因素與社會生活的關係這個方面有所疏忽、論述不足嗎？那麼弗洛姆對馬克思主義做補充有什麼不好？

對此我有兩個回答：一是弗洛姆並不是“補充”馬克思主義，他是先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一種他所規定的人道主義，然後進行了傷筋動骨的改造；二是我這裏關心的不是如何評價這種改造，理論界和學術界對此有太多的討論和爭論，我的疑問不是這個，我真正感興趣的問題是——如果弗洛姆並不是個別的例子，而是這些年左翼理論發展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大家共同認可的“學術趣味”（讓人不禁想起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共有的文化趣味），那麼它和《資本論》的大方向有沒有偏離？如果有，原因是什麼？這和我們這裏討論了半天的新中產階級在 20 世紀的崛起有沒有關係？既然當代進行符號生產的知

識分子大多都是已經進入體制的學者和教授，他們大約都具有中產階級的身份，那麼會不會或者有沒有已經出現了某種中產階級的左翼？或者中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

這樣的疑問盤旋在我心裏已經很久，但是問題太大，每想起，都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給予評斷。但是，隨著 2008 金融危機之後《資本論》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以《資本論》的視角重新審視當代的思想形勢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訴求——在這樣一個新的形勢裏，我想我的這些疑問是有意義的，是可以討論的。齊澤克這個人喜歡到處演講，一方面宣稱自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另一方面又一再很認真地說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雖然他的思想經常花裏花哨（整天罩在拉康的陰影裏，他似乎只能這麼思考和言說），不過他的悲觀主義倒可能是實話。早在 1949 年，薩特在回答有關當時的“世界公民運動”的一次詢問的時候，說過這麼一段話：如果拒絕介入具體的、現實的政治，那麼運動只能招徠“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中某些正直的、惶恐不安的、變化不定的、毫無政治經驗的階層”。他這說法，讓我聯想到齊澤克，他的悲觀主義的根子來自哪里？是不是因為他來自薩特所說的某些“階層”？

《文化縱橫》：從世界社會主義理論演進的視角來看，從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視角看，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經驗？中國又是如何在廣闊的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以自己漫長的歷史經驗與思想方法，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和理論有著怎樣的價值和意義？

李陀：我覺得思考這一類問題，是不是可以縮小一些，在一個相對比較具體的範圍裏思考更好一些？中國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有震驚了世界、被普遍認為是人類歷史奇跡的改革開放，都是有成功、有挫折的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而這種複雜性的直接表現，就是在一個特定時期裏，這樣或那樣的難以調和、也難以認識的某種矛盾會變得十分尖銳，成為社會諸矛盾中的一個關鍵結——這樣的矛盾/關鍵結，往往會形成一個歷史難題。可是，由於這樣的難題很少能夠一下子以正面方式解決，因此在很多情況下，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有意繞過。這不僅在以往的歷史中，而且在今天的現實裏，也是如此。

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至 2019 年的 GDP 已經達到 14.343 萬億美元（世界銀行），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這是非常驚人的成就；可是另一面，中國的基尼係數 2019 年已經達到 46.5%，而美國 2018 年的基尼係數為 48.5%——這兩個數字也同樣驚人，中國作為一個不發達國家與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基尼係數竟然相差無幾，怎麼回事？這需要解釋，可是解釋起來並不容易，是我剛才所說的“難題”之一。在這些難題面前，簡單地對改革做肯定和解釋，都是難以說服人的。深思起來，問題複雜得多，例如，既然這是在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發生的，那麼它是為了“拼經濟”而不能不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嗎？是由於在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裏，如阿明揭示的那樣，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工不得不處在這種全球性現代剝削體系的最底層所造成的結果嗎？如果是這樣，這個體系和中國的體制又是什麼關係？其中由種種交叉、阻斷和糾纏所組成的矛盾該如何分析？這都是需要做細緻研究的。

當然，不願意下這種功夫的人，往往認為事情其實很簡單，並無秘密可言。其中一個的說法是，中國由於改革已經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滑入全球資本主義，因而形成這樣嚴重的貧富分化是難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只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回頭路已經沒有。但是，這樣的看法卻面臨著不少反證：投入全國之力進行幾千萬農民脫貧的大工程，並且立下一個不論是大江南北還是邊疆塞外，都一律要在 2020 年實現消除絕對貧困人口這樣沒有一點市場精神的堅硬指標；寧願經濟發展受到巨大損失，包括迫使很多企業倒閉或轉型，以實現對綠水青山的保護，努力讓 14 億人口和自然生態之間保持平衡；明知道短期內收益不足以抵債，可能出現一個威脅經濟全局的灰犀牛的大風險，堅持建設一個覆蓋全國的“八縱八橫”高鐵網絡；還有，即使國營企業存在種種問題，和市場經濟之間形成巨大的矛盾，也帶了種種經濟風險，因而在國內外為人詬病，批評的聲音接連不斷，但整個改革仍然在堅持公有經濟為主體的方針，堅持國有企業的建設和發展，等等。

這些違反市場規律的經濟行為，在幾十年的改革進程裏實在是不少，可是往往被看作很自然的事，似乎本應如此，要不怎麼叫改革？其實，如果細心想一想，這些行為都是不能用資本主義包括國家資本主義給予充分解釋的，世界上有哪一種資本主義會做這些不僅不符合市場理性，也違背“經濟規律”的瘋狂事情？只是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就必然遇到我剛才提出的那一類困難：這些東西和中國的體制是什麼關係？這全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嗎？那麼“石頭”是什麼？“河”又是什麼？其中由種種交叉、阻斷和糾纏所組成的矛盾該如何分析？能不能找到新的分析框架？從而擺脫肯定和否定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

如果把眼光轉到更多和意識形態相關的領域，類似如此複雜，不容易得到簡單答案的情形就更多。就在去年，網絡上展開過一場關於 996 工作制的大爭論，很值得注意。本來這種工作制早已經通行全國，一方面大家習以為常，實際上被合理化；另一方面，996 的安排早已讓成千上萬的白領們筋疲力盡，特別是中青年族群猝死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然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誰也沒想到，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馬雲竟然拋出了一個講話，他不但肯定了 996 工作制，甚至還說：“我個人認為，能做 996 是一種巨大的福氣”，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馬雲這樣說的時候，一定沒有想到會有什麼麻煩。然而，這樣的“幸福觀”很快在網絡上引來一片“罵帖”，於是一場網絡大討論或大辯論由此而起。

現在回頭再看，這是一個茶壺裏的不大不小風波，不過很值得琢磨。首先，無論攻方還是反方，雖然都認為 996 工作制明顯是違反勞動法的，可是其焦點很快變成了當代青年人是否應該有“奮鬥精神”，它是不是屬於某種正常的“公司文化”這樣的論爭，以至於 996 工作制不合理的真正核心問題，或者與核心問題在邏輯上緊密相關的一些其他重要的問題，都完全沒有涉及。比如，這樣的一個制度，究竟怎麼在改革過程中獲得了可以忽略，可以同意，並且悄悄繞過勞動法的合法性？怎麼就被國家、社會和個人默認了？這制度和經濟改革有什麼樣直接和間接的關聯？它和阿明說的那個在全球化過程中形成跨國剝削體系有沒有關係？還有，為什麼當 996 終於引起青年人的氣憤，群起批判和質疑的時候，不少人卻很樂意把問題具體化、微縮化、原子

化（這背後其實隱藏著以獨立“個人”做出發點來解釋世界的原子論邏輯，一個所有自由主義思想不能不依賴的本體論基礎），當作個人求發展的某種個人選項來討論？所以，一場看似茶壺裏的風波，其中隱含的問題可是一大堆，有實踐的，也有理論的，都不簡單。

當然，要求參與討論和辯論的青年們對這些問題做深刻的理論分析，是不現實的。不過，這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怎麼沒有看到知識界、思想界裏有人發聲？理論思考本來不正是專家、學者們的專長嗎？怎麼一點漣漪都沒有？你可以解釋說，每天新鮮事這麼多，很多人可能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過這麼一件事。可是在今天，既然網上任何一隻蝴蝶翅膀的抖動，都會形成一場風暴效應，怎麼這只蝴蝶就一點也沒有引起注意？而且，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如果知識界關心了、介入了又如何？能把這辯論中具體問題抽象到一個理論層次嗎？能把它們和全球資本主義化這樣的大背景聯繫起來討論嗎？能把 996 工作制這一個具體問題複雜化，聯繫勞工歷史，聯繫 20 世紀服務階級的興起和由此形成的社會新結構，聯繫政治經濟學，從而揭示隱含其中的深刻的思想內容嗎？我很懷疑。

自“文革”以後，國內的知識界主流從來沒有完全擺脫對《河殤》所象徵的“文明”的迷信，改革歲月裏不少波濤風浪，可這種迷信像一團迷霧，一直和千萬知識分子一路相伴而行，從霧中眺望，遠方總有一片藍色的海洋讓他們神往——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各種變身在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得以盛行幾十年，這種神往正是其思想基礎。即使到了今天，親身經歷了西方中心論在精神上的崩塌，又親眼目睹了世界性民主制度的危機，他們是不是能夠從濃霧中走出來？很難說。一個國家的知識界在漫長的幾十年裏集體右傾，不是批判而是肯定資本主義，這在近代知識分子史上是罕見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個奇跡——一個非常沉重的“奇跡”，因為它正好夾雜于為世人驚歎的改革奇跡之間，兩個奇跡之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思想和知識空白——貫穿於 20 世紀的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艱難思考，就被這空白虛掉了。想到這樣一個背景，996 工作制風波遭到知識界完全的盲視，或者見到了也有意忽略，那有什麼可奇怪的？

最後，再說幾句和剛才所說有聯繫的另外一些話題。最近幾年，特別是今年世界疫情大暴發之後，西方不少學者和理論家已經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著根本的變化；而且，無論是對這變化做出必要解釋，或者是為順應這變化來調整今天的現有秩序，還是展望這種變化的發展方向，都已經離不開中國。這種情形當然會讓世界上很多人都不適應，特別是歐美世界（政界、商界、軍界、學界——所有各界和千千萬萬普通大眾）尤其不能適應。從作家的觀察角度去看，我幾乎可以體會他們為此而產生的那種感情和心理的雙重痛苦，那是難以形容的痛苦：一個兩三百年來被他們一直輕蔑的民族——“支那人”，突然之間（從歷史的尺度來看，是一剎那間）一躍而起，變成了世界舞臺裏一個中心角色，無論什麼節目，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就演不成，就算勉強演出了，也容易流為一場搞笑，這是多麼讓人難堪和尷尬的狀況？

說實話，我不但能想像，還有些同情他們這種痛苦。認真分析起來，可以就這複雜的感情寫一本精神分析的書，書名就叫《世紀之交的痛苦》。不過，以這樣一本書去理解和認識西方的右翼比較容易，因為從世紀之交開始發生

的這個全球性巨變，讓他們覺得五百多年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精神的，物質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正在像融雪一樣在眼前消失，眼睜睜地看著這些財富忽然開始迅速貶值，甚至可能千金散盡不復來，誰能不心急如焚？——為什麼柏林牆倒塌之後的快樂日子會那麼短暫？為什麼突然歷史宣佈自己沒有結束？為什麼冷戰寒氣一下子重返人間，讓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都覺出寒意？一切都並不奇怪。

可是相比之下，歐美許多地方的左翼情形又很不一樣。他們對這新形勢的反應，尤其是對中國問題的反應，並不能用痛苦或焦慮來形容，其中有很多模糊和曖昧。回顧起來，20世紀以來，這些左翼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如薩特、阿爾都塞、阿明），對中國的革命和改革的態度大多都相當曖昧；你去讀他們的理論著述，本來應該提到或者說到中國的地方，都是小心翼翼，或者輕描淡寫、一帶而過，或者環顧左右而言他，似乎是不提也罷。

說實在的，這種態度一直讓我很是詫異：難道不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在20世紀根本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嗎？社會主義的理想，經歷了幾百年的醞釀和發展，不是在列寧和毛澤東手中第一次在制度層面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具體實現嗎？是的，這兩個革命在實踐當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如果這些實踐以各種試驗性形成這段歷史裏最顯著的特徵（兩個革命裏所進行的各種實驗性的實踐，應該做專門的研究，成為一個知識和理論的獨立領域），這些試驗很多都是不成功的，失敗的，一些失敗還造成了各種嚴重後果，以致有些後果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宗旨和初心是完全違背的，這是事實。可是這不正應該是發展社會主義理論所必須思考和研究的嗎？漫長的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還少嗎？馬克思和列寧的不少著作不就已經對這正反經驗做了很多研究嗎？這些研究和論述不已經是馬克思主義中的理論財富嗎？為什麼輪到中國就不能做了呢？為什麼躲著呢？為什麼要繞著走？

當然這其中有很多原因，並不容易理清楚，可眼前的問題是，形勢的最新發展已經讓任何人沒有繼續躲閃或繞著走的餘地，那麼為什麼不能對以往躲閃的原因直接給予說明？能不能鼓起勇氣有所檢討和自我批評？比如，西方中心論就是一個大可深入思考的課題——我們不是沒有看到，近幾十年裏在世界範圍興起的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恰恰是左翼知識分子積極發動的，他們的努力不僅遍及歷史學、人類學、文學各個學科，而且影響全世界，形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知識的大批判、大反轉。那麼，他們今天能不能反身自問，也檢查一下左翼自家身上有無西方中心論的問題呢？

認識中國，認識中國革命，無論對當代哪個地方的左翼，都還有另一重困難，就是中國革命的複雜性——這個革命的複雜性，是整個現代中國問題方方面面複雜性的內核和基礎。當然，歷史上所有的革命都很複雜，但是其複雜性又各個不同，把這些複雜性區別開來，在每一種複雜性裏辨認它的特殊性，還把這種特殊性給予理論層面的說明，形成適合於今天知識環境的系統的理論表述，那就更困難。這困難誰來克服？誰最適合？首先自然應該是中國人自己來做。可是，儘管這些年對革命和改革的研究——無論來自左邊或右邊，來自正面還是反面——著述和文章都已經很多很多，累積起來肯定已經是天文數字，可是，專門以中國革命和改革的複雜性做研究題目的，似乎很少。也許我這感覺不準確，也許已經有很多這樣的研究，只是我所見有限。

不過，我還是願意推薦兩本書，一本是汪暉的《世紀的誕生》，一本是韓少功的《革命後記》。我覺得這兩本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問題複雜性研究的專著。因為兩書論述和討論所圍繞的主旨，雖然各有所重，論述方式和行文風格也分別很大，但中國革命的複雜性，中國社會主義的複雜性，中國改革的複雜性這三個複雜性作為思考對象，一直貫穿兩書的論述之中，既是他們在敘述邏輯上構成區別於其他革命史、思想史和意識形態史等寫作的鮮明特徵，也是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完全可以具有中國作風的證明。何況，在當今大疫情正在劇烈改變世界的時刻，汪暉和韓少功的思考有了新的重要意義，認識中國問題複雜性尤其有了迫切性。或許我們不能贊成兩人論述中的一些具體意見（我自己對書中的一些看法也不盡同意，和他們有過討論和爭論），不過，真希望兩書對複雜性的探索，能夠對所有關切中國問題的人有所啟發，有助於我們擺脫肯定和否定這種粗糙的思想方法，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探索和尋找新的更實事求是的分析框架。我還想，這兩本書若能夠譯成英文或其他外語，讓世界其他國家和地方的左翼有機會瞭解中國思想家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問題是怎麼想的，又是怎麼上升到理論層面進行批判性思考的，那一定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對歐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左翼。

在《保衛馬克思》的一個注解裏談到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區別的時候，阿爾都塞說他同意這樣一個意見，“黑格爾和馬克思不是喝同一口井裏的水”。這裏可以把這句話再發揮引申一下：如果不從社會主義思想的原理和革命理論的源頭上說，而是就進行革命的環境和條件來說，就這樣具體的環境和條件所產生的理論成果和鬥爭策略來說，就這些理論成果和策略思想所採取的語言表達來說，中國革命者——無論是毛澤東還是他的前輩，還有他的學生——和歐洲的革命者其實“不是喝同一口井裏的水”。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之根源可能就由此而來，並且也形成西方左翼知識分子思想生活裏一個長期的難題。這麼看，他們總是躲躲閃閃繞著走的那種困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同情的。想一想，即使他們認真讀了汪暉和韓少功的書，就一下能理解嗎？就能一下轉過身來，很樂意地嘗一嘗中國井裏的水嗎？好像不很容易。不過，這也用不著太在意，關鍵還在我們自己。歷史提供了一個難得又罕見的機會——全世界都在向中國發問或追問：你們是哪里來的？你們是誰？你們要到哪里去？

我們能不回答嗎？能不努力給出一個至少自己滿意的答卷嗎？

原文網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M2NDcwMg==&mid=2664308320&idx=1&sn=cef888206cf9d1567ad89fb6e275e0&chksm=8b54f491bc237d87443010b2cf83c53a8c7878a216c4ce99321954c78f0b3a30fdda1d7c1226&scene=126&sessionid=1596160228&key=8c6fdd3cc892e824917d3920ae0e51887736273d167527d98f7bd32d90faa0cfeff94994218be8b7c9cd0c537d1d7c483f230db4cddb809f6a5adc5528379685f9262c7de3d0d5d78a5bf317e40943bc&ascene=1&uin=NjA5ODk0Mzgx&devicetype=Windows+XP&version=62090529&lang=zh_TW&exportkey=AtkSI4K%2FiKfYxf7wpzTr7gA%3D&pass_ticket=3SFTiwESI IKljSP%2BZx%2BXDSJ8isYfuJSHI%2FPD5farKBDQIUGwE0B%2BV9S4hggL2Yv3